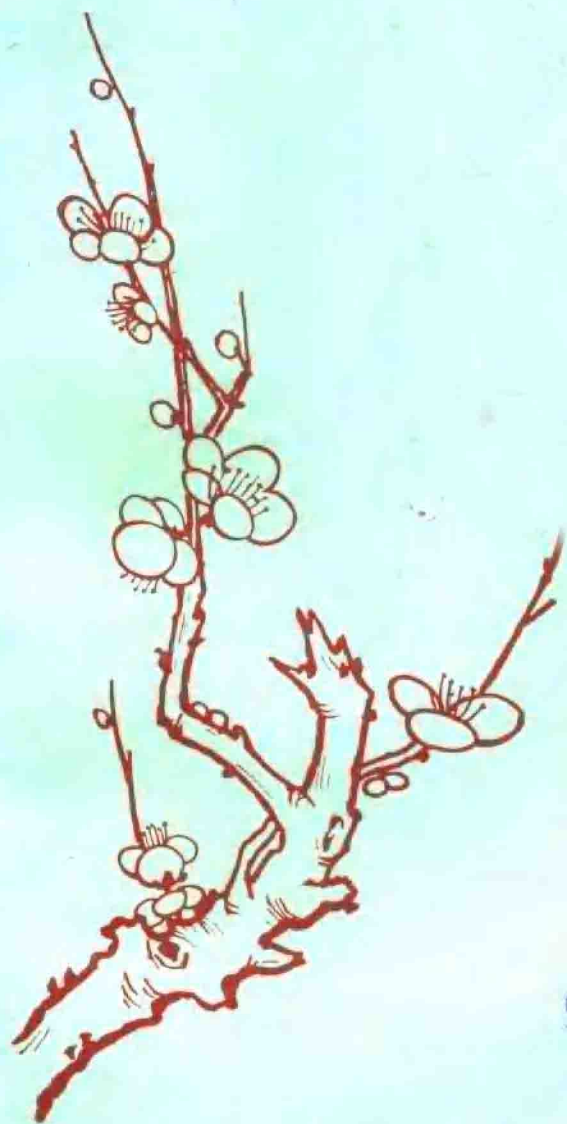


浙江革命史料特辑

(五)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革命史料
特 辑

(五)

浙江革命青年运动专辑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

(国内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1年8月

浙江革命史料特辑（五）
浙江革命青年运动专辑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
（国内发行）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萧山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25 字数158,000

1981年10月 第 一 版

198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500

统一书号：11103·53

定 价： 0.67 元

目 录

难忘的无产阶级革命献身者

——纪念曾任江浙区共青团委书记的徐玮烈士

.....	骆耕漠	(1)
关于徐玮同志的若干事迹.....	史 永	(24)
徐玮烈士在国民大学.....	陈修良	(27)
早期共青团领导人卓恺泽烈士		
.....	卓华山 严式轮	(29)
卓恺泽烈士遗书.....		(42)
陆定一同志给卓恺泽之子华山的信.....		(43)
宁波早期工人运动领袖王鯤烈士.....	胡章生	(46)
蓓蕾年华映血波		
——忆青年革命诗人殷夫.....	张雪痕	(61)
火一样的青春		
——记青年女烈士胡焦琴.....	白 岩 整理	(66)
“赤脚大仙”柴水香同志.....	鲍浙潮	(73)
共青团农委樊仲甫烈士.....	鲍浙潮	(76)
樊仲甫烈士在狱中的斗争.....	张雪痕	(78)
宣中华的“杀宣统”一文.....	陈功懋	(82)

“灯塔”歌声永不泯

——忆党的好儿女宣华芳同志……………杨 光（84）

山鹰高翔

——纪念徐婴同志……………葛维裘 陈洛宁（92）

生得英勇 死得光荣

——忆青年共产党员赵如翰烈士……………张 光（99）

林勃烈士和独立中队……………余 瑾（108）

一个提着白匪头颅去当红军的少先队员

……………周长胜（113）

当我参加儿童团的时候……………陈 阜（118）

少年儿童团在抗日救亡斗争中成长

……………韩心一、施裕才、周应法（124）

宁波青运的先锋——启明和培英女校

……………金翊群（130）

党的一个联络机关——嵊县坎流小学党支部

……………柏 生（138）

临海青运的摇篮——乙丑读书社…陈鹤亭（147）

抗日青年在天台县政工队的斗争

……………张子敬 徐道荔（160）

“五四”洪流中的温州……………王建辉整理（174）

沙文汉同志战斗的一生……………陈修良（184）

文史动态：浙江在京革命老同志撰写回忆录……………（223）

难忘的无产阶级革命献身者

——纪念曾任江浙区共青团委书记的徐玮烈士

骆耕漠



徐玮烈士遗像

徐玮同志，是我初参加共青团革命活动时的第一个难忘的引路人。每当回忆谁帮助我开始真有点革命觉悟的时候，徐玮的英勇高大形象就立即显现在我眼前。全国解放后，六十年代初期，杭州市党委约我撰写徐玮烈士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领导浙江党和共青团的革命活动直至英勇牺牲的光辉事迹，我曾一度回忆和搜集他的那一段历史，后因“四

清”运动而搁下。近两年来，各地党组织按照中央指示，十分重视征集革命文史资料，又促使我时时回忆徐玮同志，并利用我接触到的一切线索、一切机会、一切条件，去寻访他一九二七年以

前的身世和革命经历，幸能尚有所获。我从他的大哥徐宝康老人那里，知道他小学、中学、大学时期的一些可贵事迹，得到他一九二六年春在上海参加孙中山先生追悼会时拍的一张仅存的照片（见本文文首）；从嵇直、史永（沙文威）、陈修良（女）、黄逸峰等同志那里，得悉他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年（四月）间，在上海参加小沙渡（沪西工业区）团区委和江浙区委工作的许多重要史实；还从刘瑞龙同志那里得知徐玮烈士留给家乡群众的革命影响。现在，连同我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间跟徐玮同志直接在一起工作的情形，一并忆述如下：

（一）

徐玮同志，一九〇三年生，江苏省海门县人，原名徐宝兴，家中排行第二。他的家庭是一个旧式耕读人家，父亲徐锡龄设私塾（后名私立广育小学），以教读为业。徐玮小时从这个小学开始学业。一九一四年，他升入海门县立高小，在升学考文中写道：

“我不仅要能够自治，还要使天下人都能自治。”一九一九年，他升入海门中学，在一次学潮中因揭露校方营私行为而遭开除，遂转学苏州东吴大学附中，后直升大学本科。他上大学是靠父兄向亲友求借支持的，故读书十分勤奋。在东吴期间，他深受五四运动影响，宣传新思想，传播无神论，反对基督教，又遭开除，转到上海南方大学求学。这期间，徐玮同志已萌革命大志。他曾抒情写道：“人生好比替换赛跑，前人走几段，我走一段，后人又不绝地向前走……”（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年，南方大学校长、国家社会主义者江亢虎，向废帝宣统私下跪呈奏折的丑事被

揭露后，徐玮同志同部份进步师生一起掀起驱江运动，旋即从南方大学分裂出来，另立国民大学，徐玮同志即在该校续学，他进的是该校英国文学系。他毕业于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三年冬，他经嵇直同志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名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即转为正式共产党员（嵇直今在民政部工作，全国政协委员）。在团中央的领导下，他同嵇直等同志一起组织小沙渡工人俱乐部，对上海工人运动作出贡献。五卅运动期间，他同一些同学到海门，代表上海市学生会，向当地群众宣讲上海日商纱厂和巡捕房枪杀工人顾正红的惨案经过，进行募捐运动，支援上海罢工工人。一九二六年春，上海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会，徐玮同志参加了这个活动，现在仅存的那张遗照，就是他那时会后拍摄的，他胸前佩带的小白花签条，是入场时发的；他小帽上的白顶，是吊念他刚去世的父亲的（此为徐宝康老人所告）。他当时那样身穿平民短服，是为了更便于接近群众和在工人住宅区进出活动。这是一张很有纪念意义的遗照。

据今在上海市政协的陈修良同志回忆，她一九二六年上半年在国民大学读书，同徐玮同志同过团支部生活，徐当时已是党员，任团支部书记。她还回忆说，徐玮同志当时常分配她去小沙渡工人俱乐部夜校教书，帮助她接近工人，宣传革命；徐玮同志在工人中的威信很高。她还记得那年暑假后，她同沙文求同志和一位女同学到广州中山大学求学，是徐玮亲自写组织介绍信给团中央负责人施存统和张秋人同志的。

今在北京全国政协的史永同志，回忆他一九二六年六、七月曾跟徐玮同志一起，参加领导小沙渡区各工厂的团支部工作，当时徐玮任团部（区）委书记，他任组织委员。他说，徐玮同志非

常善于用群众熟悉的事例和易懂的语言，讲工人切身的问题，启发他们的觉悟和斗志，是“很好的宣传鼓动家”。

根据史永同志的回忆，一九二六年七月，他和徐玮同志曾一起开过一次会议，听项英同志的报告（详见史永文）。一九二七年一月间，史永同志从宁波再来上海参加中央党校学习时，徐玮同志已调任江浙区团委书记，曾前来向他了解宁波地区团组织的详细情况；现在南京大学的匡亚明（当时叫匡梦苏），是当时江浙区团委委员。“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徐玮同志一度离沪去武汉。

前年十一月，我在上海向黄逸峰探询他是否知道徐玮，使我意外得知，他当年在上海参加共青团，就是徐玮同志介绍的。他说：“四·一二”事变后，徐玮同志去过武汉，以后，他就不知徐玮同志的消息了。

一九二七年，徐玮同志有个重要革命活动（不过我现在仍未搜集到更多的资料），那就是：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军攻进上海南市、闸北区前夕，上海党中央直接领导和组织上海工人和各界群众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斗争，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二次起义所未完成的艰巨战斗任务，随即组织起我党和国民党合作领导下的上海特别市政府委员会。当时，徐玮同志是武装起义斗争的团的方面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化名“谢公弢”，被选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委员会委员之一。（徐玮同志的这个史迹，我是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他被叛徒出卖和在狱中从秘密买进来的报纸上看到有关的披露之后才知道的。详后。）

(二)

杭州市团委在“四·一二”事变后遭到破坏，书记石天柱被捕，团中央派徐玮同志来负责浙江省和杭州市团组织的领导工作。我是一九二七年八月间在杭州加入共青团的，不久就见到和熟悉了徐玮同志。当时，他用团市委的代号“秦明”这个名字，还用过“谢公弢”的名字。徐玮本名，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到杭州后，不幸只为党工作了几个月，十一月初，杭州党、团组织在开展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中，党的省委军委的机关被破坏，团市委机关也牵连被破坏，徐玮同志和一位市委委员曹作兰（省立医专学生），还有两位机关工作同志，一起被捕。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徐玮和曹作兰同志，在杭州小车桥陆军监狱内的刑场上英勇就义！（另两位同志，一姓郑，鄞西人；一姓李，台州人，是否以后也遇难，现在记不清了，难以确断。）

下面，是徐玮同志当年直接刻印在我脑海里的形象和事迹，我先回忆他在被捕前在杭州的革命活动中的几件重要的事情。

（1）我入团后，就在我的母校——浙江省立商业学校发展团组织，被选任支部书记，不久，李宣平同志（台州人，中等瘦个子，面容清秀，知识分子，约二十几岁，团市委委员，领导一区区委所辖全市各学校支部工作），特来通知我，带我第一次去见团市委书记“秦明”，说他看了商校团委支部的工作报告，有事要同我谈谈。我们那个报告，向市委汇报了团支部如何通过学生会揭露一个专替国民党卖力的高年级生那种不学无术、吹牛拍马、投机钻营等恶劣表现，使他在同学中陷入孤立，从而顺利地扩大

了团支部的外围影响，又讲到校内有个教务主任，是流亡到武汉而又回浙江的，对国民党有不满，我们将外面散发的革命传单暗地里放在他的桌上，以影响他……。徐玮同志见我后，问我流亡在武汉时的情形，接着他向我说：揭露国民党、扩大团的影响，要从近处、小处抓具体问题着手，你们抓住那个国民党坏家伙的显而易见的短处做文章，很好，以后要多学点革命的策略；你们把传单私放在那位主任的桌上的做法，不妥当，不合秘密工作方法，以后不要那么做，想办法影响他，争取他，则是必要的。最后，徐玮同志向我说，为了自卫，团准备挑选少数团员学习打手枪，问我能参加吗？我说，我在武汉教导团只扛过几星期长枪，还未实弹打过靶，如团指派我学，我能学会。以后，徐玮同志告诉我，这项计划，团方面不搞了，还指出搞政治暗杀，一般是不妥当的，不必要的，以后我慢慢懂得这当中的道理。

第一次印象总是特别深刻的，这次谈话使我深深感到他谈话深入浅出，能非常及时教育下面初参加革命和没有经验的青年同志。我当时觉得他比我年长得多，以为他已三十内外（今知实际只大我五岁），这主要是因为他身材粗壮，特别干练，有能力，有办法，同时也因为他当时扮着失业穷教师模样，穿着脱色的旧兰竹布长衫，戴着一顶不很合时的褐色旧呢帽，特别是脸上有些斑疵，且已有些皱纹。——现在我明白，当时是由于近三年的中层党、团领导的革命重担，使他过早失去他二十二岁时那张照片上的青年气色。虽然如此，那照片上有力的眼神，微鼓的嘴唇，仍是我当年初见他时的逼真神态和特征。五十多年后重见这遗照，好象他同当年一样在思考，准备向我们说什么。

（2）大约是同年八、九月交接之际的一个星期天，团市委在

杭州浙江省立医专的一个较偏僻的教室里（医专的团支部是强有力的）举行有四十多人参加的活动分子大会，事先由李宣平同志负责布置，约定名义是利用假日余闲，听讲卫生常识。有一位团员，奉化人，黄埔学生（名已忘），在场外流动放哨，万一有情况，就按约向校内外从容疏散。徐玮同志在会上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讲到：杭州虽然暂时是国民党右派的天下，但是我党在社会上很有影响，他们背叛“三大政策”，投降帝国主义，勾结地主旧军阀，不得人心。他指出，青年团员要学习革命策略，善于结合男女青年当前的切身问题，如毕业就是失业，婚姻不自由，妇女不能独立，青工活重钱少，无俱乐部学习等问题，向群众作合法宣传，把他们逐步组织起来。报告中，他举例介绍西大街女中有两个团员（记得一个叫邬凤英），宣传妇女如不走出家庭，没有独立谋生能力，就无妇女的任何解放可言，她们在女生中博得了威信，也讲到商校团支部如何利用国民党喇叭手的恶劣表现，把他们孤立 in 群众之外等等，作为鼓励。

徐玮同志还请省委的一位代表陈云一同志向大会讲话，陈说，团应同时注意开展对工厂青工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充当好党的后备。（全国解放后，陈按民主人士待遇，在国务院参事室当参事；他因有个经济建议曾来找我研究，我还认得出他，谈起往事，他也还记得起杭州医专里的那一次活动分子大会，他对徐玮同志也是很怀念的。）

一九二七年九月间，杭州皮市巷嵊县会馆内一个私立小学的大教室里，由徐玮同志主持，开过杭州党团活动分子联合大会，到会有三、四十人，中年多（那时的中年，即三十左右的青壮年），青年学生少，有铁路工人，工厂工人……。这次会场，徐

玮同志责成我负责布置，这时我已担任团的一区区委书记，当时皮市巷和这会馆内外是僻静地方，小学学生不多，星期假日无人，馆内有几幢屋，只住几户妇孺人家，有个小学教员住在里面，商校有个嵊县籍团员叫黄德鋈，同他熟悉，由黄约他假日出去逛西湖。这样，我们放几个哨，就可控制会馆内外，万一有什么情况，一时散不尽的人就约定说是在商议合股设行经营家乡土产贩运买卖。会前，徐玮同志还派李宣平同志来检查安全。这次会议专为听取中央代表夏曦同志的传达报告。他一口湖南口音，戴眼镜，扮做殷商模样。他说，武汉国共分裂后，党中央开过会，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取消主义（这后一个词，我当时是第一次听到），决定撤销他的领导职务，提出组织工农武装斗争，趁国民党内部有派系矛盾和时局不稳的形势，加以有力的反击。又说，城市里要广泛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是投降帝国主义的新军阀，要组织和开展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要动员和输送有觉悟的工人、学生到农村去参加工农武装斗争，等等。他报告的时间，大概一个半小时，他的话音难懂，我当时接受的水平也有限，但对以上中心意思是大致记得和听懂了的。好多年后，我才知道他传达的中央会议，即“八七会议”。那时党内，上下见面通气还是快的。

那天上午不到两小时就安全散会。会后，徐玮同志就和夏曦同志到我的住处——设在菜市桥旁一条小弄里，由两小排木楼屋构成的一个小院内的一区区委机关（和我同楼梯上下的是母女两个缫丝工人），这是一个相当好的秘密工作地点。他们二人互相说了一些话，我注视窗外动静，未去听他们说什么。那次，徐玮同志为我向夏曦作了一些介绍，夏也向我问了一些杭州青年学生

的问题，我觉得他态度较严肃，不象徐玮易于接近。

(3)在八月至十月这三个月间，徐玮同志对我的一些工作谈话，以及在我们的一次虚惊中，也给我不少教育，那也是难忘的。

有一次，就是他再告诉我不必去学打枪的那一次，他同我讲到“职业革命家”的事。他说，全市各校学生支部工作有发展，李宣平又有市委方面的工作，决定我也参加一区区委工作。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革命将是很长期、很艰巨的，党团的事业将要好几代人才能胜利完成。因此，党要培养一批批一辈子专门做地下各种秘密工作的“职业革命家”，必要时也可晚结婚或独身不结婚。我第一次听到“职业革命家”这个说法，有点好奇。他解释说，俄国共产党，从创立到胜利，就有无数的大大小的“职业革命家”，一批倒下去了，一批又起来。近年我从汇集到的材料中，知道徐玮同志直到被捕时还是独身，看到他一九二七年写的《人生》那几句短诗，更使我回忆起他一九二七年间向我说的“职业革命家”这番话时的坚决革命精神。他说，我们要靠党培养，也要靠自己磨炼。他要我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徐玮同志非常关心了解下面同志的生活困难，他知道我离开商校那个小小图书室的“管理员”半职业关系（主要是为掩护身份），和不便向家里要钱，饭钱房钱有困难的情况，在调我专门做“区书”工作后，决定在团费里月支八元补助我，而且向我解释：这是工作需要，组织决定。他的工作是何等细致，他的话是多么感人肺腑啊！

有一次在闲谈中，他问我，他的口音象哪里人？我说有点象嘉、湖口音（因为我当时没有接触过崇明、海门口音）。他说，

那好，必要时他不说是崇明、海门人，而充作嘉、湖一带人。还有一次，他同我说，上海团中央汇活动补助费来，要有几个合适的汇款地址才好，否则，时间长了会被人注意，问我有无可以用来掩护的商号关系？另一次，当衣服换季，他问我他样子合适否？当时，他还是戴着那顶褐色旧呢帽，不过换上一件深褐色的旧薄棉袍，有时罩上一件深灰旧布衫。我说，“合适，使人只以为你是一个做小本买卖的商人。”他说，对！他的衣帽都是按乔装需要，到旧衣铺去廉价挑选的，他总要戴一顶帽子，是为了可这样或那样而不全露他的脸。这些表明，徐玮同志时时处处都很警惕，善于处理地下党生活，机智地对付着敌人。

记得是党团活动分子联合大会后，有一天下午，徐玮约李宣平和我，到设在火把弄一排墙门房屋的一间楼房上的市委交通站开碰头会，那里住着一位交通同志（就是后来在市委的另一个机关里同徐玮一起被捕的那位鄞西同志）。我们三人到后，围着窗边的一张半桌坐下，徐玮拆开上海团中央的来信，用碘酒把信纸背面的秘密信显出来，上面写着：要市委准备组织和训练一批得力的团员，到农村去开展农运工作，另问有何困难要团中央帮助解决，署名记得是“何伟”（我现在还不知道是真名还是化名，是否全国解放后见过报的那个“何伟”）。密信是用米汤写的，那是当时团中央同徐玮约好的一种密写法，在当时还是简单可行的。当我们正待讨论时，我靠窗坐，突然发现有个黑衣警察，持短枪在楼下墙门外呆着，我立即请徐玮同志观察，他十分镇定地立即叫交通把来信烧掉（还另外处理了几页东西），一并丢进房内马桶里，要大家检查一下口袋，说我们是来玩的……。我们在他指挥下也立即镇定下来，我又望见警察忽然不在门外了，徐玮

说，身上没东西，我们分别下楼走吧，我们让他先下楼，我在李宣平后面走。火把弄两头都可拐出到板儿巷马路上去，我出门时，未见警察，望见徐玮同志按按他的帽子，正拐弯出弄，李宣平向另一头弄口走去，我就逆他而行，心跳完全平下了。第三天从交通那里知道，那警察是带头来抓鸦片贩的，开始把我们的墙门误认为他们要去发黑财的门牌。这个意外插曲，在我几乎是象一名新战士的实弹演出，对徐玮同志则不过是“老兵新传”，他是如何的机智干练啊！

一九二七年的十月，杭州很沸腾，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不安，又加上十月革命十周年即将到来，他们的“四·一二”罪行必将遭到各种挞伐，所以，他们就严作戒备。这时，杭州闸口铁路工人、光华火柴厂工人、全市各丝厂工人，都纷纷起来搞罢工斗争，要求改善生活，全市的中学学生，相继上街游行示威，罢课斗争，此伏彼起，反对腐朽的国民党党化教育，揭露学不致用，毕业就是失业，这些斗争在九月就开始，如纬成缫丝厂工人反对厂方残酷剥削女工、童工；商专学生罢课赶走无能的校长……，十月就更蔓延发展，互相支援响应。

这两个月来，徐玮同志的工作越来越繁忙，但他办法多，精力十分充沛，应付有余。他结合当时的学生运动实际，几个夜间写出一本《告青年学生书》的报告内容，用生动的语言，讲到男女青年学生的各种实际思想问题，一气呵成。这本小册子是借杭州青年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写的，用党的地下印刷关系，铅印成六十四开、约二十页的活页本子，印一、二千份，这在当时是很大的发行量，用积累起来团费印刷，通过工专、医专、农专、商专、杭高、横河桥女师，西大街女中等学校的团支部及其外围关

系散发出去，一时轰动全市，国民党省党部大为震惊。我后来读到列宁的《告农民书》时，觉得徐玮同志当时好象是学着列宁《告农民书》的格局写的。可惜，我一九六二年到杭州请市委编写杭州党史资料的机构去搜寻徐玮同志三十五年前撰写的这本历史意义的小册子，已经是都无踪影了。

国民党反动警犬们加紧搜索，我们党当然也注意对付，徐玮同志一面组织我们英勇斗争，一面又提醒我们要加倍警惕。记得十月下旬，在清波门内一个小学里（校长叫朱×，杭州人，当时是党员），召集工人党员骨干和团员骨干（共约十五、六人），分两间小屋布置，我在屋里，他对我们的指示要点是：近日敌探四出侦察，我们要特别注意提防，外出时身上切勿带文件、地址，万一别遭到意外，必须誓保秘密，我们额头上没有“C.P”、“C.Y”字样，是对付得了敌人的！

但是，不幸的是十一月初，李宣平同志十分难过地突然来告诉我，因党的军委机密被破坏，团市委机关被牵连，徐玮同志被捕了。宣平同志要我镇定，坚持英勇斗争。不几天，他又来通知我，敌情紧，必要时，他会掩护我，介绍我转移到宜兴，用小学教员身份做地下党工作。可是，十一月九日，我也因叛徒带便衣包探盯梢而被捕了。从那时起，直到如今，我始终不知也打听不到李宣平的任何消息，他当时是一位很英勇的好同志，我想，他以后是不会变节的，大概也在哪里牺牲了，因此，我也一直纪念着他！

（三）

徐玮同志和曹仲兰等三位同志被捕后，先是关在杭州市柴木